

中國大陸印度洋軍事存在的戰略意圖與區域安全意義

著者／錢尹鑫

國防大學海軍指揮參謀學院 105 年班
現任海洋監偵指揮部支援中隊少校輔導長

中國大陸積極經略印度洋造成周邊國家的戰略疑慮，其印度洋軍事存在不僅表達出其染指印太海域的戰略意圖與實際具體作為，並彰顯國際政治「合而不同、鬥而不破」的戰略根本格局，印太國家游移於美中兩大集團之中，藉以獲取經濟與軍事的安全利益，然而，在有限敵意的雙層賽局中，未來的印太海域將更加變化多端。

壹、前言

近年來中國大陸在印度洋的活動頻繁，中國大陸正在改變當前印太區域的安全動態平衡。未來幾年北京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影響力可能會持續擴大，引發更多的印太國家關注。2004 年美國國防部的一份報告首次使用「珍珠鍊」(String of Pearls) 一詞來指稱中國大陸在印度洋的基礎通道，該報告表明中國大陸日益擴大的區域影響力可能會對美軍在印太區域的能源供應形成潛在威脅，特別是在與臺灣發生衝突的情況下，而部份學者警告說北京試圖管理印度洋，其他學者則認為中國大陸政府正在不斷擴大其貿易利益，並尋求確保海上貿易供應線不受干擾。¹ 顯見，中國

大陸在印度洋的軍事具體作為已然衝擊到整體印太區域的動態平衡，其軍事存在與作為主要目的為何？將帶來怎樣的影響？對於印太區域的安全有無衝擊？對我國將會造成怎樣的影響？因此，中國大陸的軍事意圖與影響殊值研析。自 1980 年代以來，共軍海軍經歷了大幅的軍事事務革新和發展，並繼續推行海軍現代化計劃，曾經依靠陸上支援並主要由巡邏艇組成的傳統海軍已轉向一支由主要戰鬥人員組成，有能力獨立行動更能在中國大陸周邊和世界各地投射力量的現代化部隊，再加上中國大陸在空中飛彈能力方面的進步，使共軍的防禦能力不斷提高，可以抵禦諸多形式的攻擊與沿海以外遠程的投射力量，而且有可能限制或阻止美國在東北亞、南海和臺灣的軍事行動。² 因此，研究中國大陸印度洋軍事存在，

不但有助於吾人解構其戰略意圖與區域安全意義的實質內涵，更能從中發覺預應之道，藉以預先掌握區域內的不穩定變數。

貳、灰色地帶與政治經濟獲利

國際社會地緣政治競爭正在超越外交和常規戰爭的空間中逐漸展開，這種競爭的性質迫使美國必須面對身為世界大國的相應責任。各國考慮到與美國交戰的巨大損失以及現代越來越多的間接和非軍事工具可供使用，競爭對手正在尋求不觸發升級的情況下取得相對成果的方法與維持政治經濟持續獲利。這些方法通常位於國際常規與公開對抗之間的競爭舞台上，被稱為「灰色地帶」(Gray Zone)。灰色地帶有時也被稱為混合威脅，是現今低於直接戰爭程度的強制工具，例如：資訊作戰、政治壓迫、經濟強制、網絡作戰與代理人對抗…等都可以包括在內。³ 當前中國大陸、俄羅斯、伊朗、朝鮮以及其他非國家行動者正越來越多地轉向這些戰略，以對抗美國在全球外交、法律和商業上的優勢並在對美國債務與價值取向不對稱的基礎上，試圖提高其不對稱性來改善美國引發的安全威脅。⁴ 對印太國家而言，渠等對威脅的認識不同、缺乏資源和能力、機構間協調薄弱、意識形態差異大、經濟現況也不相稱，應對區域強權驟升的緊急事態更加困難，例如：中國大陸與印度在洞朗 (Donglang) 地區的對峙即為顯例，而印太國家也正正面臨著日益增長的自由主義和民粹主義滋擾等問題。此外，各國

政府也意識到美國日益加劇的政治分化，美國對雙邊主義的偏愛與各國涉外交往已不再以相對收益 (Balance of Interest) 為優先考量，川普以「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 做為選擇政治盟友與政策趨向的行舉，將使得美國失去與印太國家的有機連結。印太國家需要思考如何在經濟領域容納美國，在安全領域容納中國大陸提供新的途徑，同時制定更適當的多邊方法，以保持國家的核心利益並確保自由和開放的印度太平洋。⁵

當前美國和印度政府正在為印太地區製定一個廣泛而全面的架構、深化針對印度洋的情報合作，以應對日益激進的中國大陸及其在印太地區的代理人所帶來的強制性挑戰。這樣的結構超越傳統的國家治理和人道主義的普遍問題，另可置重點於應對恐怖主義、水下和地下電纜、海上交通線和航行自由等挑戰。⁶ 然而，中國大陸與東協於 2002 年 11 月正式簽署的《中國大陸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ASEAN and China)，2005 年 7 月 1 日開始推動更進一步的貨品貿易自由化，雙方零關稅品項目覆蓋率在 2010 時達 90% 至 95%，中國大陸與東協除了在 2010 年建立自由貿易區之外，中國大陸與東協各國亦有雙邊協議的簽署，一連串的經濟佈局，實際上仍框架在更高頂層設計的大戰略之下，乃是透過經貿協定來延伸中國大陸在東協的影響力。⁷ 進而擴展至印太海域各個國家，使之成為區域內的最大強權。而各國政府也意識到只有走出自己的道路才能維持自身的安全

與利益，當印太國家不再以美國、中國大陸或其他強權的政策馬首是瞻之時，追求本身的相對自主需求，調整國家行動方針或政策選項，則成為自身在國際社會獲利的關鍵守則。

參、中國大陸國家行動成本與所望目標的合理期待

中國大陸在印太海域的政策趨向早已非侷限於傳統非友即敵的狹隘思維，而是改以其他非軍事的綜合途徑來達到國家目標。其國家行動成本與期望報酬並非僅限於國力強弱、軍事威脅與意識形態等外顯行為，而是審慎考量彼此的相對收益，進而對他方行為做出合理估算並對己方行為做出合理選擇，因此，中國大陸建構印度洋軍事存在已是必然，其戰略意圖本文分述如下：

一、建立海外支持系統，整合海外行動

中國大陸決策者已經意識到維持海外駐軍的價值，無論從政治結盟、軍事戰略或經貿需求等，都需要強健的海外支持系統，而中國大陸駐軍海外最重要的就是海軍，中國大陸可以在印度洋海域集中戰力與資源，支持各項海外行動並對區域強權造成相當程度的牽制效果。中國大陸戰略家已經在討論將個別領域的戰略要項納入海外支持體系的必要性，個別領域的戰略要項從「點」連接到「線」進而擴展至「面」，未來勢必整合政治、經濟與軍事將作戰資源一體化，提高整體勝戰的能力。中國大陸人民解放軍指揮學院的官員更是明白描述了一種未來的基礎佈局，即是「結

合點、線與面」和控制海外關鍵地緣要點，⁸積極建構戰爭面並藉以發揮全面性的戰略價值。另外，整合海外行動亦能使企圖損害中國大陸核心利益之國家或組織，不得不考量後續延伸的連鎖效應與後果，並加以評估對方的合理行為與己方的合理選擇。

二、維護海上交通線，維持海外利益

依據英國海軍戰略學家科白（Julian Corbett）海軍戰略的觀點，海上貿易的安全性與該國海軍艦艇數量無關，保護貿易船團的重點在於海上交通線，也就是船團行走的航道，而航行路線與海域地理有極大的關聯，方能維持海外利益。⁹中國大陸國際貿易航線對其國家發展至關重要，產品若無法向外輸出，滯留國內將延誤經濟發展進而影響民生，而中國大陸海路貿易過度依賴印太海域，其海上運輸僅有 3% 的商船不需經過麻六甲海峽，¹⁰ 主要是因為麻六甲海峽的航線最短可以縮減運輸成本，也可以避免海盜的襲擾問題，但也因此而形成了「麻六甲困境」，中國大陸在印太海域的軍事存在亦可確保麻六甲海峽東入口的航道安全。其海軍主要任務之一即保護中國大陸的海上通訊線（Sea Line of Communication, SLOC）和維護海上交通線，這兩項都需要在印太海域才能具有戰略意義並向前發展。其次，準確及時的情報對戰場決策至關重要，海上交通線的暢通將為情報資源提供職能服務，也相對地支持共軍海軍的防禦策略。

三、縮短補給時間，增加兵力投射能力

中國大陸海軍遠洋能力的不斷提升，不僅使海

軍艦隊能在南海和印度洋執行災害防救、打擊海盜與人道救援任務，而且也能使其海軍艦隊具備初階的遠征能力與經驗。對於共軍海軍的艦艇戰略部署而言，印太海域的軍事存在或海上基地可成為兵力倍增的工具，使其能有效在南海與印度洋進行制海作戰與增加遠程兵力投射能力。如果北京的影響力逐步向外延伸的話，這也能使其進一步在南海建立防空識別區。然而，若僅有海軍補給艦則不能滿足海軍的需求、人員救濟、設備維修以及國外泊位設施的不確定性，是限制海外行動長期存在的因素，因此，中國大陸在海外港口的軍事設施下一步便是建立「海外支持系統」。同時亦能透過有效的海外部署縮短補給時間並擴大海外行動，進而建構其海外戰略優勢。此外，除了不斷強化遠距離的兵力投射能力外，海外軍事存在亦是地緣政治與戰略的核心工作，可使共軍艦艇不受續航力的限制，甚至是向東突破第一、二島鏈，向西進入印度洋地區，直接影響印太周邊國家核心利益。

四、推行一帶一路倡議與強化外交參與

中國大陸在印度洋的軍事存在既代表著多年來不斷擴大的經濟和海洋安全利益，也代表著作為北京海上絲綢之路的一部分，在非洲和印度洋地區開展更深層次戰略接觸的序幕。為了推行一帶一路倡議與強化外交參與，研究中國大陸廣泛外交政策的三個特徵是有幫助的，包括：中國大陸公民向非洲的移居以及北京在非洲大陸不斷增加的外交參與、越來越重視海上軍事力量和維護國外公民以及一帶一路倡議。多年來，中國大陸

的經濟增長趨勢已經隨著其全球外交雄心與安全需求而發展。這些動機促使中國大陸在非洲、東南亞從事貿易和居住在國外的中國大陸公民數量穩步增加，私營企業緊隨國有企業之後，諮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在 2017 年 6 月份的一份報告中估計，非洲大陸有超過 10,000 家中國大陸企業在經營，其中，大約 90 % 被認為是私人公司。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經濟參與不斷增加，同時也加大了外交努力與援助，並有 2,000 多名中國大陸士兵擔任聯合國在非洲的維和人員。¹¹ 為達國家戰略目的，中國大陸國家行動成本與所望目標的擘畫將會透過印太海域的軍事存在逐步設法完成。

五、為其他海軍基地預作因應與準備

中國大陸打算建構海上基地作為維和人員的支持和後勤系統，以及支持反海盜行動的海軍設施。在印度洋北部，瓜達爾（Gwadar，位於巴基斯坦）和漢班托塔（Hambantota，位於斯里蘭卡）的港口經常被認為是成為未來戰略重點的候選國，瓜達爾位置優越，可以覆蓋荷姆茲海峽（Hormuz Strait），這是中國大陸進口能源的重要通道。而漢班托塔則為印度洋的中轉站提供了絕佳的補給、修理和停泊點，¹² 中國大陸有了吉布地（Djibouti）海軍基地，已在其貿易線的盡頭確保了軍事存在。這將提供作戰所需補給品和其他支援，以協助共軍海軍在亞丁灣的反海盜巡邏、維持和平行動以及印太海域的海上交通線。其次，為其在該地區的海軍外交提供一個樞紐，可以協助未來的反恐行動並有助於情報收

集，此外，這將有助於加快該地區中國大陸公民的權益維護。總體而言，其近期主要目的將是支持中國大陸在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經濟利益，並協助展開戰爭以外的軍事行動，為其他海上基地預作因應與準備。

肆、中國大陸在有限敵意下的區域安全意義

國際社會的交往互動時常是處於既衝突又合作的複合情境，建構於敵意與善意交織運用的模式，這是一種不確定的戰略關係，但彼此敵意卻是有限的。中國大陸在印度洋的軍事存在雖具威脅成分，但也賦予印太區域一定程度的安全意義，而如何解讀中國大陸的作為，則需視彼此交往意願與能力，有限敵意的概念自然也說明善意與敵意之間並非純粹是階段性或功能性關係，而是相互建構的過程。

一、強調和平崛起，釋放戰略紅利

中國大陸強調的和平崛起與其他涉外發展國家的根本性不同，以往發生衝突事件和危機時，中國大陸基於保護海外利益的各項作為皆是被動引發的，本身並無侵略他國念頭，並強調中國大陸的戰略優勢可以為印太各國帶來政治穩定、經濟發展與軍事和諧，並為其提供打擊海盜、因應緊急事態、災害防救與人道救援行動，而且不會像其他國家海外基地被運用於進行攻擊性軍事行動。中國大陸強調和平崛起與提供「公共服務」，並努力將「一帶一路」戰略的安全範圍最大化，

以減輕有關中國大陸地緣政治意圖的負面報導，而釋放戰略紅利將使其能夠在危機發生之前逐步轉變其戰略態勢與爭奪話語權，以穩定和控制局勢，中國大陸甚至可能在穩定各國內部治理、經濟需求與確保社會秩序方面發揮協調性的作用。然而，從共軍部隊結構的演變反映出應對國家安全威脅的實際作法，例如：中國大陸始終未放棄武力犯臺並設法將美國排除在海峽兩岸的行動範圍之外、反威懾沿海和區域防禦、保護海權與維權、遠海保護和區域外作業等，這也解釋了其建造更多現代化的 L 級艦艇（LPD 和 LHD）藉以用來對臺灣施加軍事壓力。顯見，中國大陸仍逐步發展其海軍能力，重新檢視任務所需並調整其採購與發展的需求，從中國大陸海軍結構的建構來看，中國大陸正試圖平衡一系列資源競爭、重疊和複雜的軍事任務，以實現更大的政治目標。

其次，依其海軍結構的發展更大的理由解釋了其建造柴電潛艦和核動力潛艦的軍事戰略目的：柴電潛艦目的是使美國海軍不敢進犯；核動力潛艦則用於「域外行動」，減慢美國海軍從戰區外的到來速度，並可能進行未來的反介入（Anti-access）與區域拒止（Area-denial）任務。另外，建造較新的 L 級艦船還可用於執行遠海任務，例如：非戰鬥人員撤離行動、反恐行動、人道主義援助等。¹³ 中國大陸於印度洋的軍事存在，不斷標誌著中國大陸軍隊向國際事務行動提供後勤支持的能力，儘管中國大陸經常淡化印太海域軍事存在的威脅意義，而強調其支持和後勤作用，但最近的實彈演習以及有關海軍基地可容納多達

10,000 名士兵的報導，卻也實際顯示其海軍基地的軍事作用仍不斷增強。¹⁴

二、區域安全平衡，有限敵意下的互動交往

2017 年 8 月 1 日，中國大陸在東非國家吉布地開設了第一個共軍海外軍事基地，這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對印太國家產生了很多疑問：吉布地是第一個基地嗎？為何中國大陸需要海軍基地？又將如何使用？它們適合中國大陸的軍事戰略嗎？以上問題殊值研析，許多印太國家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師正在思考同樣的問題，對於臺灣也將會有間接的影響，因此必須掌握這些問題，方能了解北京打算如何向國外投射軍事力量與其真正的戰略思維。中國大陸近年綜合國力大幅成長，經濟發展亦有長足進步，印太國家為了獲得中國大陸所釋出的經濟紅利，就必須權衡考量並接受其所需的政治要求或其他領域的讓步，且不能與其核心利益相互衝突，形成政治壓迫與潛在敵意。因此，彰顯國際政治「合而不同、鬥而不破」的戰略根本格局與有限敵意下的交往模式。以在吉布地的海軍基地為例，中國大陸打算未來幾年在非洲建立更多的海軍基地和設施，吉布地基地是中國大陸重要的海軍基地，將利用吉布地基地作為控制印度洋的跳板，中國大陸的情報收集能力無疑地將得到提高，這給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和情報行動帶來了風險，其施加的海軍力量將不亞於美國海軍在 1954 年後在世界範圍內實現的力道。然而，共軍海軍不太可能取代印太海域的美軍及印軍，更有可能的是，中國大陸利用該基地來主要支持其在該地區的經濟活動、

提高其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和救災的能力以及開展反海盜和反恐行動的能力，¹⁵ 藉以強化區域影響力。這也將使得吉布地對美中兩大陣營的策略將呈現左右逢源的搖擺態勢，經濟依賴中國大陸，安全靠攏美國，並藉此得到區域內的安全平衡與經濟發展機會，而其他非洲國家未來也有機會起而效尤，形構為國際政治有限敵意下的雙重賽局。

三、印太國家的選擇不在美國和中國大陸之間

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年度國防與安全會議第 18 屆香格里拉對話（Shangri-La Dialogue），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開幕詞中表示：「兩者如何解決其緊張局勢和摩擦，將在未來幾十年內定義國際環境」。菲律賓國防部長德爾芬·洛倫扎納（Delfin Lorenzana）強調「地震地緣政治這種轉變正在改變二十一世紀國際關係的格局，並產生劇變和緊張局勢」。越南國防部長恩戈·軒利希（Ngo Xuan Lich）認為「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競賽正在日益發展，而且越趨激烈與複雜，部分原因是權力平衡的快速變化」。¹⁶ 顯見，印太海域部分國家徘徊於美中兩大集團，儘管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聲明稱太平洋足夠大，可以容納美國和中國大陸，但北京仍在努力阻止印太國家與美國進行軍事演習，並加強各項控制與影響力，中國大陸藉由印太國家的工具型地位試圖維持有限敵意下的合作，這是理性的估算與抉擇也是其未來經略印度洋的基礎軸線。而川普政府對亞太地區採取的方法中的確有一些受到印太國家批評的地方，例如：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

關係，導致印太國家反對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某些政策。

多年來，印太國家一直保持國際政治的中立立場，拒絕表態支持任何一方集團，但是無論他們喜歡與否，該地區的人確實刻正面臨兩方的壓迫選擇。美國的益在於維繫和保護自身國家的航行自由與霸權主義，以便它可以與該地區的國家進行貿易和互動，而不會產生不適當的負擔。¹⁷ 然而，北京給予的經濟利益卻符合印太國家治理所需，如果這些國家願意接受中國大陸的表面保證與經濟紅利，承諾履行開放政策，那就必須面對其他領域的未知風險，這點使得印太國家始終無法放棄中國大陸這個有高度價值的國際社會成員，卻又不得不提防其各項作為。而美國對中政策顯然是意欲聯合他方壓迫其國際發展與各領域作為，同時迫使印太國家與中國大陸切割或犧牲其部分國家利益與美合作，因此印太國家的選擇不在美國和中國大陸之間，而是一種「鐘擺策略」，是有限敵意下的戰略競合。

四、臺灣在印太戰略中的特殊角色

美國在印太海域的主要挑戰者分別為中國大陸與俄羅斯，特別是兩岸關係於印太戰略中特別敏感。在美國國防部 2019 年 6 月發布的《印太戰略報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揭槩：美國視台灣為維護國際秩序強大的民主夥伴。這已具體實踐在批准 66 架 F-16V 軍售案、首屆「美台印太區域民主治理協商機制」、美國參議院通過《台北法案》，以強化支持臺灣與印太地區及全球其他國家正式外交或非正式的夥伴關

係等，¹⁸ 顯見，美國企圖抵抗中國大陸的區域強權影響力與維護長年所建構的印太民主秩序。因此，美國對於臺灣的國際事務參與提升國際能見度將大有助益，此外美國為避免敏感的軍事議題刺激中國大陸，未來也將會在其他非傳統安全領域，例如：人道救援、防疫、災害防救、打擊跨境犯罪、新媒體運用以及大數據等諸多領域，提高與臺灣合作的頻次與力度，使得臺灣的價值不僅是地緣政治與軍事戰略的「硬層次」，而更將融入民主自由與維護人權普世價值的「軟層次」，而在這樣的國際氛圍下，臺灣在強國更高頂層設計的印太戰略之中，方能持續國家發展並發揮協和互助的特殊角色，同時也更能彰顯臺灣於國際社會的適應性與共融性。

伍、結語

中國大陸在印度洋的軍事具體作為已然衝擊到整體印太區域的動態平衡，現代越來越多國家使用間接和非軍事手段，在尋求不觸發危機升級的情況下取得相對成果的方法與維持政治經濟獲利。這些方法常被稱為灰色地帶，也由於這些灰色地帶使得地緣政治與國際格局之多極變化，印太國家得以發揮既能與美中合作又能讓美中互為牽制，甚至本身處於影響美中決策的關鍵位置，得到左右逢源的良好發展機遇。其次，中國大陸基於國家行動成本設計，期望達到合理報酬的願望目標，不斷建構印度洋軍事存在的戰略意圖與作為並審慎考量彼此的相對收益，進而對他方行

為做出合理估算並對己方行為做出合理選擇，其與印太國家的交往關係雖具威脅成分，但也賦予印太區域一定程度的安全意義，彰顯國際政治「合而不同、鬥而不破」的戰略根本格局與有限敵意下的交往模式，亦是有限敵意下的戰略競合。未來印太國家對於美中交往模式，將呈現左右逢源的搖擺態勢，經濟與安全分別依賴中國大陸與美國，並藉此得到區域內的安全平衡與經濟發展機會，但亦不會過度親密得罪任何一方，而其他印太國家未來也有機會起而效尤，形構為國際政治有限敵意下的雙重賽局。因此，未來的印太海域將更為波濤洶湧，國軍應需提昇整體國防實力，以因應未來變化多端的印太局勢。

1 Zack Cooper,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China’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Indian Ocea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April 2, 2018,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ecurity-implications-chinas-military-presence-indian-ocean>.(Accessed 2019/11/18)

2 Anthony H. Cordesman, “The PLA Navy,”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24, 2016,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la-navy>. (Accessed 2019/10/18)

3 CSIS, “By Other Means Part II: Adapting to Compete in the Gray Zon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ugust 13, 2016, https://www.csis.org/analysis/other-means-part-ii-adapting-compete-gray-zone?utm_source=CSIS%20All&utm_campaign=2a8dad9736-EMAIL_CAMPAIGN_2017_12_31_COPY_01&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f326fc46b6-2a8dad9736-201487781. (Accessed 2019/11/5)

4 CSIS, “By Other Means Part II: Adapting to Compete in the Gray Zon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ugust 13, 2016, https://www.csis.org/analysis/other-means-part-ii-adapting-compete-gray-zone?utm_source=CSIS%20All&utm_campaign=2a8dad9736-EMAIL_CAMPAIGN_2017_12_31_COPY_01&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f326fc46b6-2a8dad9736-201487781. (Accessed 2019/11/12)

5 Jeffrey Ordaniel and Carl W. Baker, “CR4: ASEAN Centrality and the Evolving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Pacific Forum》, Volume 19,March 11, 2019, pp. 5-15.

6 Aman Thakker, “U.S.-India Maritime Security Cooperatio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8, 2019,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s-india-maritime-security-cooperation>. (Acceed2019/11/11)

7 王文岳, 「中國大陸對東南亞政策布局」, 《2019 年中國大陸對美戰略及周邊外交布局》, 2019 年 4 月, 頁 13-16。

8 Conor Kennedy, “Strategic Strong Points and Chinese Naval Strategy,” 《China Brief》, Volume19, Issue6, October 24, March 22, 2019, pp. 19-25.

9 宋吉峰, 「中共南海填海造島戰略意涵」, 《海軍學術雙月刊》, 第 50 卷第 1 期, 2016 年 2 月 1 日, 頁 84-88。

10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 Involving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2011,” U.S. DoD, 2011, p. 21.

11 John Fei, “China’s Overseas Military Base in Djibouti: Features, Motivatio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China Brief》, Volume 17, Issue 17, December 22, 2017, pp. 7-10.

12 Conor Kennedy, 李育慈譯, 「中共海外戰略支點構想」, 《國防譯粹》, 第 46 卷第 10 期, 2019 年 10 月, 頁 42-47。

13 Christopher Yung, “China’s Evolving Naval Force Structure: Beyond Sino-US Rivalry,” 《China Brief》, Volume 18, Issue 9, May 30, 2018, pp. 12-16.

14 John Fei, “China’s Overseas Military Base in Djibouti: Features, Motivatio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China Brief》, Volume 17, Issue 17, December 22, 2017, pp. 7-10.

15 John Fei, “China’s Overseas Military Base in Djibouti: Features, Motivatio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China Brief》, Volume 17, Issue 17, December 22, 2017, pp. 7-10.

16 Bonnie S. Glaser, “The Choice for Southeast Asia Is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ne 21, 2019,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hoice-southeast-asia-isnt-between-united-states-and-china>. (Accessed 2019/11/11)

17 Elbridge Colby, “Southeast Asia Must Deal With the World as It Is,” 《Pacific Forum》, Volume 35, June 21, 2019, pp. 1-2.

18 US Taiwan Watch, 「從《印太戰略報告》到《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美國對台灣的戰略定位愈發清晰」, 《關鍵評論網》, 2019 年 11 月 6 日, 參考網址: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7064> (瀏覽日期: 2020 年 2 月 8 日)